

彭通湖 主编

熊甫 刘方健 副主编

四川近代经济史

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四川近代经济史

彭通湖 主编
熊甫 刘方健 副主编

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李运元

封面设计：梁建成 袁野

书 名：四川近代经济史

主 编：彭通湖 副主编：刘方健 熊 甫

出版者：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四川省成都市光华村西南财经大学内）

邮政编码：610074 电话：(028) 7353785

排 版：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照排部

印 刷：郫县犀浦印刷厂

发 行：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全 国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开 本：850mm×1168mm 1/32

印 张：16.5

字 数：405 千字

版 次：2000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200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000 册

定 价：26.80 元

ISBN 7-81055-631-2/F·521

1. 如有印刷、装订等差错，可向本社发行部调换。
2.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前 言

中国经济史是一门与历史学联系十分紧密的经济基础学科，它具有边缘学科的性质。解放后，对这门年轻的学科的研究取得了较大的进展，但对我国内地或地方经济史的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为深入研究中国经济史，准确、全面地反映中国经济在不同地区的发展特点，有必要大力开展地方经济史的研究。地方经济史的研究，对于准确地掌握国情与省情，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提供历史借鉴和科学依据，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四川是一个内陆大省，具有许多与沿海各省不同的特点，四川又是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的经济中心，在全国经济发展中具有特殊的地位，为此，近年来我们开展了四川近代经济史的课题研究，在各级领导的支持下，《四川近代经济史》被列为“七五”四川省重点研究课题。

《四川近代经济史》研究课题由四川大学经济系中国经济史教研室担任，凌耀伦教授任课题负责人，彭通潮副教授担任本书的主编，熊甫教授、西南财经大学的刘方健教授担任本书的副主编。裴倜副教授、陈昌智副教授及于建玮讲师也参加了本书的工作或编写。在历时几年的编写过程中，我们以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观为指导，本着“论从史出，史论结合”的原则，搜集和整理了大量的历史文献和史料，参阅了近年来有关本课题的一些最新研究成果，力求准确、系统地反映近代四川经济的发展全貌和全过程，研究内容涉及了近代四川的农业、工业、商业、外贸、交通运输、财政、金融等。研究过程中，我们注意突出四川近代经济与全国经济发展的共性与个性，注意四川经济发展的特点及地区上的差异性。希望通过对

这些问题的探索,对中国近代社会的演变,特别是对内地经济的发展,能有一些新的认识,以有助于进一步认识四川省情与中国国情,并通过历史的借鉴,有益于四化宏业,有益于四川的经济建设。

本书共 12 章,彭通湖撰写了第一章、第二章的第一节、第二节、第五章、第八章、第九章;熊甫撰写了第三章、第七章、第十一章、第十二章的第三节;凌耀伦撰写了第六章、第二章的第三节;刘方健撰写了第十章、第十二章的第一节、第二节;于建伟撰写了第四章。本课题的组织工作以及全书的修改、审定工作由凌耀伦、彭通湖、熊甫同志担任。刘方健同志对本书进行了最后的校注等工作。

为了保持史料的原来面目,本书中的货币及各种计量单位,一律采用当时的名称。

在本课题的进行中,四川大学、四川大学经济系的领导、四川省社科联和四川大学科研处给我们许多具体的指导和帮助。四川省图书馆、成都市图书馆、四川大学图书馆、西南财经大学图书馆、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给我们很多宝贵的资料和图书方面的支持。四川大学教授何守义教授,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张学君研究员也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宝贵的史料,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作为第一部全面系统反映四川近代经济发展的著作,本书具有较多的拓荒性,研究过程当中我们也遇到了许多困难和问题。限于资料和研究水平,书中难免有错误或遗漏,欢迎同行和广大读者予以指正。

目 录

前言.....	(1)
第一章 重庆开埠前的四川农村经济概况.....	(1)
第一节 鸦片战争前后的四川农业生产.....	(1)
第二节 四川农村的封建土地制度	(12)
第三节 四川农村的封建剥削	(27)
第四节 四川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	(39)
第二章 重庆开埠前的四川工商业	(50)
第一节 四川城乡商品市场的扩大	(50)
第二节 城乡手工业的发展与资本主义的萌芽	(82)
第三节 四川井盐业资本主义手工工场的发展	(88)
第三章 重庆开埠前四川的对外贸易与财政金融.....	(103)
第一节 四川的对外贸易.....	(103)
第二节 重庆开埠前的四川财政.....	(112)
第三节 重庆开埠前四川的货币金融.....	(138)
第四章 四川近代交通运输业和贸易的兴起与发展.....	(143)
第一节 列强入侵川江与川江航运业的发展.....	(143)
第二节 四川近代公路、铁路、航空业的兴起 与发展.....	(167)
第三节 重庆开埠后四川对外贸易的发展.....	(174)
第五章 重庆开埠后的四川农村经济.....	(188)
第一节 重庆开埠后四川农村经济的变化.....	(188)
第二节 封建土地关系的强化.....	(206)

第三节	封建剥削的加重·····	(217)
第六章	四川资本主义机器工业的产生·····	(233)
第一节	抗战前四川近代工业发展概况·····	(233)
第二节	抗战前四川近代工业的特点·····	(263)
第七章	重庆开埠后四川的财政与金融·····	(274)
第一节	重庆开埠后清政府财政搜刮的加剧·····	(274)
第二节	民国时期四川军阀的财政搜刮·····	(287)
第三节	重庆开埠后四川银行业的兴起·····	(300)
第四节	“川政统一”后的四川财政与金融·····	(325)
第八章	川陕苏维埃经济·····	(332)
第一节	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建立·····	(333)
第二节	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农业·····	(340)
第三节	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工业和商业·····	(350)
第四节	川陕革命根据地的财政·····	(362)
第五节	川陕革命根据地在经济建设中的教训·····	(374)
第九章	抗战时期的四川工业·····	(380)
第一节	国民政府的战时工业政策·····	(380)
第二节	东部工业的内迁·····	(392)
第三节	抗战期间四川工业的发展·····	(403)
第四节	官僚资本垄断地位的形成·····	(419)
第五节	抗战后期四川工业的衰落·····	(424)
第十章	抗战时期的四川农村经济·····	(434)
第一节	国民政府的战时农业政策·····	(434)
第二节	战时四川农业的发展·····	(447)
第三节	战时四川农村经济关系·····	(468)
第十一章	抗战时期的四川财政、金融及外贸·····	(479)
第一节	抗战时期的四川财政·····	(479)
第二节	抗战时期的四川货币金融·····	(488)

第三节	抗战时期的四川外贸·····	(497)
第十二章	战后四川经济的总危机·····	(504)
第一节	战后四川工业危机·····	(504)
第二节	战后四川农村经济的崩溃·····	(507)
第三节	战后四川财政及金融危机·····	(513)

第一章 重庆开埠前的四川农村经济概况

在重庆开埠之前，四川农村一直处于停滞或缓慢发展状态。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开始一步一步地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由于地处内陆，交通极其不便，外国资本对四川的经济侵略遇到了比东南沿海及长江中下游地区更多的障碍，四川农村只是间接地或部分地受到外来的影响，从总体上看，四川农村依然保持了基本完整的封建经济结构。尽管自然经济出现了某些解体的迹象，农村商品经济也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在整个社会经济中仍占统治地位。在封建生产关系的束缚之下，农业生产力长期停滞不前，农村的阶级矛盾也日趋尖锐。

第一节 鸦片战争前后的四川农业生产力

历史上，四川素以发达的农业和丰富的物产而闻名中国。至明清以来，由于封建生产关系的束缚，四川农业发展非常缓慢，农业生产力比中国东南沿海等地区更落后。在手工劳动的条件下，四川农业生产主要依靠历史上积累的生产经验来维持；农产品的增加，也主要靠扩大耕地面积，提高复种指数而不是依靠农业技术的改进。乾嘉以来，由于人口不断增加，四川境内地旷人稀的历史已经结束，人口的增长与耕地面积相对减少的矛盾，已经对农业生产形成了现实的压力。在康熙时，“蜀有可耕之田，而无耕

田之民”^①。但在乾嘉之后，除四川的少数边远山区之外，平坝好田好地已经基本被垦辟完毕，若再要扩大耕地面积，必须投入更多的劳力和资金，困难越来越大。与此同时，四川人口却仍在迅速增加，四川的人均耕地面积已显著下降。农业劳动生产力的停滞，已直接影响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农民收入的增长。

一、农业生产技术的状况

生产工具不仅是社会控制自然的尺度，而且也是社会生产关系的指示器。鸦片战争前后，四川农业生产技术处于停滞状态。从农业生产使用的工具看，各地农村仍普遍使用着各类手工工具，这些手工工具自唐、宋时期大体定型以后，几百年中，几乎没有多大的改进。人的体力在农业劳动中仍然是最重要的因素。各地的铁匠铺或作坊打出形态各异的铁锄、铁犁、铁铧、铁铲、耙、锹、镰等供农民使用。农业耕作当中主要的动力是水牛、黄牛以及少量的马、驴、骡等畜力。牛是农民除了土地之外最珍贵和最重要的财产，除春秋担负耕田耙地外，还是农村中最主要的运输工具。另外，农民家中还有禾斛、拌桶、手摇风车、耨马、晒簞、米筛、背篋、背夹、囤席等辅助性生产工具。在水源较充足的地方，农产品加工采用了水碾、水磨、石碓等工具。在四川农村，农业生产工具不足是很普遍的。一些贫苦农民甚至连犁、耙等生产工具也需临时租用别人的。一些地方，因农民无力养牛或耕牛不足，相当大一部分田土只有靠农民用锄头等工具一点点硬挖出来，效率之低，可想而知。春耕大忙季节，甚至有一些地区以人代替牛耕田犁地，“以人代牛，数人牵挽于前，一人秉耒于后，^②”并非罕见。若遇灾年，这种情况更多。直至光绪年间，仍有不少这类记载：“闻去年川东等处，饥荒之余，牲畜已尽，所有耕作等事，均以人

① 康熙《清实录》，卷36，7~8页。

② 乾隆《广元县志》，卷8。

代，困苦颠连之状，言之酸鼻。”^① 由于生产条件极端简陋，生产工具几乎没有什么改进，提高农业产品产量主要是依靠增加劳动力的投入，通过精耕细作和提高复种指数进行集约经营。乾嘉以来，四川人口因为移民和自然增殖已经大量增加，在技术停滞的条件下，在有限的土地上大量投入劳力，虽然可以使农产品的总量增长，但平均每一个劳动力所生产的农产品并无明显的增加。由于荒地、林地被大量垦殖，植被减少，水土流失加剧，农业生态已有恶化的趋势，自然灾害也日趋频繁。

二、水利及农田设施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四川各地水利条件差别很大，成都平原的华阳、双流、广汉、温江、崇庆、郫县、新都、灌县、金堂、德阳、什邡、彭县、以及眉山、夹江、乐山等地的大约 200~300 万亩耕地可以从都江堰等水利设施中受益，基本上可以得到灌溉而旱涝保收。在这些地方，上百条纵横交错的大小河流和数以万计的小沟渠组成了复杂的灌溉网；“沟洫脉散、疆里绮错；黍稷油油，粳稻莫莫。指渠口以为云门，洒漉池而为陆泽”^②。这些地方历来是“天府”的核心地带，是四川的粮仓。

在四川广阔的丘陵和山地，人们普遍采用修筑水堰、塘、池、凼、埝等多种多样的水利设施取水灌溉。清朝以来，康熙、雍正、乾隆、嘉庆等几个帝王和四川的地方官比较重视水利建设，曾采取官修、官民合修等形式主持修复或兴修了不少水利工程。在官方带动下，一些乡绅、士民也捐资、垫资或集资兴修了一部分水利工程，对于防止水患、水旱，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均起了部分作用。如：

汉州上柳梢堰，乾隆二十八年（1763 年）修竣，“工方施，而潺泉出，经月而水势益大，知其足灌溉，众皆欢然，次年高下皆

^① 《皇朝经世文编》，卷 6，18 页。

^② 《蜀都赋》转引自吴焘：《游蜀日记》，19 页。

倍收”^①。

射洪广寒堰，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修成，可灌田3 000余亩^②。

三台惠泽堰，乾隆年间由乡绅垫资扩大疏通旧堰修成，计可灌田16 500余亩^③。

盐源上干海子堰，道光元年（1821年）修成，宽八尺，深八尺，总长四十余里“凡上、下干海堰皆水也，资灌溉者数千亩”^④。

芦山天生堰，康熙时经知县主持兴修，知县卢知熊“博采輿情，履亩劝农之暇，相待原隰毅然举工，捐资俸，备锹锸。”修成之后，“田间沟渠错落纵横，蓄水高下，尽成沃壤，远近皆沾其利，收获十倍于堰成之前”^⑤。

在不能修筑水堰的地方，则依靠泉、涧、陂、塘、水井、水池等蓄水灌溉。人们掘土为塘，“以蓄天雨，有余则蓄之于塘，不足则出所蓄以池于田；源泉涓涓，昼夜流注，穿渠而引之，旱涝可以无忧”^⑥。如在内江“邑山多田少，溪河卑下，民田种稻，无引灌之利，秋冬不能蓄水，春耕为难，夏旱或乘，尤多仰叹，故利在多置塘堰，以备时愆。”^⑦

四川的汲水工具可以说是多种多样，五花八门，桔槔、辘轳、戽斗、龙骨水车，人力、水力或畜力的筒车和翻车、轮车等，应有尽有。在丘陵和山区，最常见的是龙骨水车和筒车。龙骨车的形式和古代基本相似，其小型者一人之力可挽，大型者则需三四人共同用力踩水。四川农村的龙骨水车除少数是用手摇的外，较常见的是两人用脚蹬踩的水车。车水是一件耗费大量体力的劳动，

① 嘉庆《汉州志》，卷7。

② 光绪《射洪县志》，卷3。

③ 民国《三台县志》，卷2。

④ 光绪《盐源县志》，卷2。

⑤ 民国《芦山县志》，卷2。

⑥ 道光《昭化县志》，卷3。

⑦ 民国《内江县志》，卷2。

车水者即使是寒冬腊月，也常常身披单衣、汗流夹背。一般水车只能将水从低处搬往高处一二米，若更高的田地需水灌溉，只有几架水车共同衔接作业，逐级将水输往高处。农忙时节，找人帮忙车水必须付出较高的工价：“农忙车水之际，佣力工资，有高至八钏十钏一日者，甚至有十二、三钏以上者，尤须酒、饭、菸、茶待遇周到，否则招之不来”^①。如遇久旱不雨，各地农民常常为争夺有限的水源以命相拼。在河堰，水塘等处，车水之声昼夜不息，取水的人穿梭往来，人们经常因争夺水源等而相互斗殴，甚至出现大模模的械斗，酿成人命案件。地方政府每年都需花费巨大精力来管理、调停这类争水事端。

筒车通常在水源较充足的地方固定安装，它利用河溪流水作动力，推动高轮运转吸水灌溉。高轮一般高二三丈至六七丈不等，用木枳承接入沟，引水灌田^②。筒车一般是“横江作堰、架高木置大轮车，斜缚竹筒于车尾、推轮吸引江水倒倾岸上，始导入田中，虽山田亦可达”^③。

在丘陵或山区，四川农民还常常用挑水或背水等方法汲水灌苗，依靠人力艰难地在崎岖不平的小路上将水一点点浇入田地，这种方法虽然落后，但在天旱之时也可救活几棵禾苗。

在四川各地，尤其是那些边远山区或深丘地带，由于山高坡陡，道路崎岖，人们无法修筑堤堰或水塘，从井、泉等处汲水也万分艰难。这些地方的田地大多是“望天田”或“雷鸣田”，这些田地收多收少、收与不收，全赖“天老爷”是否开恩下雨。如川中地区：“农有五谷，邑只种稻，梁菽不多，其它概不树艺，不论倚溪就涧，挹岭环山之田，大都全赖天雨，素乏塘堰以资蓄池。”^④

① 民国《德阳县志》，卷3。

② 嘉庆《邛州志》，卷13。

③ 乾隆《潼州府志》，卷2。

④ 乾隆《岳池县志》，卷1。

在灌县西北山区：“其穷于人力者，则专恃雨泽，如中兴乡凤凰山、瓦窑四周之田及城厢、蒲阳、漩口、三阳所辖山地随处有之、丰畜皆以雨为断，俗称天花水云”^①。

一般来说，对丘陵山区农业危害最大的就是旱灾，若久旱不雨，常常是田地龟裂，颗粒无收。在这种时候，人们想出了祈求老天或龙王下雨的“办法”。四川各地求雨的方式五花八门，或由僧、道法师设坛念经；或在太阳下身穿蓑衣、头戴斗笠，抬龙王、河神等菩萨塑像游街；或摆牺牲供品于龙王庙，众人磕头长跪；或请艺人于龙王庙前唱戏；或由人扮作旱魃，众人用黄荆条儿“鞭打”，以驱旱魔；或入夜后于各高山顶上堆起柴草放火烧天。大旱时，经常可见千百人结队求雨，焚香磕头，仰天悲号……稀奇古怪，不一而足。由于大部分丘陵及山区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很弱，农业的收成没有多大的保证。

三、耕作制度

四川地区之间自然条件差异很大，加上地区间的经济交流相当有限，因此耕作制度在地区之间有很大的差异。

1. 在成都平原等地区，由于土地肥沃，灌溉条件又好，大多采取夏季种稻，冬季接着翻田栽种小麦、油菜或绿肥苕菜等，一年可收两季，农业收成也比较稳定。

2. 在山地或丘陵地区，土地分为田、土两种。田除分布于山间的坝子或河溪之傍外，另外还有依山随势开辟的梯田，一些地方的梯田从山脚开至山顶达几十层之多。梯田层层、交相辉映，甚为壮观。这些梯田以种水稻为主，因取水不易，一般采用蓄“冬水田”的办法耕种，即秋天收获水稻以后，加固或修整田埂，利用秋雨蓄满田水，供来年春夏之际栽种水稻，这种方法一年只能收获一季水稻。蓄冬水田对扩大山区种稻面积起了重要作用。在

^① 民国《灌县志》，卷3。

雍正二年(1724年)四川水田只有21 455 616亩,到嘉庆时已增加到46 348 646亩^①。

在丘陵或山区的坡地上,主要是栽种玉米、小麦、碗豆、胡豆、大豆、高粱、红薯以及其它一些经济作物,一般也可一年两熟。到乾嘉之后,因人口增长等因素,四川的丘陵地区也进入精耕阶段,多数地区已形成了“田种禾稻,山种杂粮,相资为用”的耕作方式。土地的复种指数也有所提高,“前种未收,后种已下”。农民“于沃土种百谷,瘠土则以种苕”^②。一些地区于田边地角,广种桑树,即使在种茶之地“也多于茶树下,间种玉米”^③。大春、小春作物在丘陵山区的土地上交相更替,通过充分利用土地,增加收获。

3. 在四川盆地的西部高原及盆周高山地带,因地处高寒,土地贫瘠,进行种植业的条件很差,农业尚处于粗放经营阶段,土地开发利用还较落后。这些地区的农民或少数民族除在少数地区栽种水稻外,大多在山地上栽种各类杂粮,一般一年只收一季,产量很低,但因地多人少,广种薄收也可维持生计。这些地方的农业是很落后的,农业几乎都是靠天吃饭。如在懋功:“平时灌溉并无塘堰涿者蓄水,全赖天时,难施人力,其高下之间,即已异,宜地山雪融,土润多晴,而愈见滋荣,……土乾无雨,则立成枯藁”^④。在凉山一带彝族地区,当地少数民族“杂居多傍山坡,诛茅为屋,随地开垦,种杂粮苦荞、包谷、燕麦。无稻田,不知耕地,垦地以所掳汉人为之,黑彝安坐而食,收杂粮年仅足用,无余积”^⑤。直至光绪年间,西康地区农业仍然处于原始状态:“番人不效法耕稼之事,榛狉自封。只知畜牧,迄今牧者多,耕者少。而

① 王纲:《清代四川史》,533页,成都,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1。

② 道光《仁寿县志》,卷15。

③ 道光《南江县志》,卷上。

④ 光绪《懋功屯乡志》,(不分卷)。

⑤ 光绪《雷波厅志》,卷32。

所种之谷，不过收麦与豆箕。山高水冷，不产百谷之处无论矣，而能产之处如巴塘，杂瑜，产稻谷，种之者鲜矣。耒耜仍如神农之法，斫木、揉木为之犁，……、具不系牛项而系于牛角。又不粪其土，不辩驢、刚、赤、缁之地，焉知羊粪、牛粪之宜”^①。

在四川的一些少数民族地区或边远山区，直至清末仍保留着“刀耕火种”的习惯。这些地区大多森林茂密，人烟稀少，人地比例关系宽松，加之生产力低下，没有进行精耕或水旱轮作的可能和必要，人们利用这种耕作方式获取自然肥料，节省人力和休养地力，以最简单、廉价的方式获取农产品。采用这种方法自然不可能充分利用土地，但在当时、当地仍不失为一种因地制宜方法。

少数民族地区或边远山区农业虽然落后，但当地资源丰富，盛产林木、药材、矿产、山货、皮毛等内地稀缺的物资，加之当地地旷人稀、价贱粮轻、租税负担较之内地也要轻一些，每年仍吸引了一些人从四川的平原及丘陵地区迁入这些地区谋生。

四、单位面积产量的估计

四川各地区之间自然状况和生产力发展程度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加上各地区之间经济交流有限，地区经济上仍存在不同程度的封闭状态，度量衡自然是十分混乱的。以度而言，“同一尺也，有土布尺，杂货尺，棉带尺，成衣尺，鲁班尺之殊”；以量而言，“大别有大斗，小斗两种”，“大小斗之外，复有米斗、包谷斗、杂粮斗、桐籽斗、菜籽斗”；以衡而言，“各项营业，秤称不同，有屠称、盐称、油称、糖称、京果称，山货称。”^②在这种情况下，很难正确地规定统计口径。加之近代四川土地面积，农产品产量的资料出入很大，真伪难辨，要想准确地估计农产品单位面积产量确实是一件难事。据一些资料看，四川农业在乾嘉之后仍然保持了较高的水平，同治年间的记载说：“今之苏松镇江等处，上地一

^① 《西康建省纪》，第2册。

^② 《长宁县志》，卷10。

亩收谷不过三、四石，蜀地有一亩收至六、七石者……故往日川东之米尝转售于它省。”^① 在彭县，清时亩产米一石二斗为上，一石为中、八九斗为下^②。若是按“一米二谷”计算，彭县上田产稻谷应为二石四斗，中田为二石，下田为一石八斗；再按每石谷折合 350 市斤计算，即上田产稻合 840 市斤，中田产稻合 700 市斤，下田产稻合 630 市斤。”这些产量在成都平原并非不可达到。大体而言，成都平原的粮食亩产量和东南农业发达地区相比并不逊色。若就全川而言，由于资料缺乏，统计口径不一，仍难于准确估计。在 1940 年，中国农民银行曾对乐山、温江、绵阳、射洪、南充、内江、宜宾、巴县、万县和安县 408 家农户的粮食单位面积产量作过较为细致和系统的调查统计，得出下表：^③

品名	农户类别	年份		
		1940 年	平常年	丰收年
稻谷（市石）	自耕农平均产量	2.94	3.41	3.89
	佃农平均产量	2.95	3.47	3.90
小麦（市石）	自耕农平均产量	0.23	0.76	0.98
	佃农平均产量	0.70	0.89	0.99
玉米（市石）	自耕农平均产量	1.16	1.28	1.61
	佃农平均产量	1.22	1.27	1.53
甜薯（市担）	自耕农平均产量	5.41	5.71	7.34
	佃农平均产量	4.50	5.41	6.67

若根据当时稻谷每石折合 350 市斤，小麦、玉米每石折合 350

① 吴焘：《游蜀日记》（同治十三年），19 页。

② 《重修彭县志》，卷 3。

③ 据中国农民银行《四川省经济调查报告》，第 131 页资料整理。